

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

呂昭明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澎湖群島閩方言三十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及其可能的問題，並進一步提出未來研究的可能取向，內容可以分成三點：

1.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研究上的可能問題：針對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語言研究而言，語言地理學「文化中心向外推移說」，很可能較歷史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的設想來得真實；一方面，較能合理解釋語言的（或方言）「擴散」（diffusion）現象。另一方面，可與歷史移民的殘缺史實相互接軌。
2. 澎湖群島閩方言詞彙、語法研究的開展：澎湖群島閩方言基本詞彙（含括音韻現象）與鄰接區域的平行對應（correspondence），或可證明島嶼區域很可能是語言（或方言）擴散波的疊置區域¹（overlapping area）；進而提出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應以聚落（settlement）為單位，朝向音韻、詞彙和語法研究語料系統觀的主張，並具體提供一套可能的研究策略及其程序步驟。
3. 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區域文化的整合研究：漁獵型地理類型、海洋民族學，以及方言區域史三種學說的結合思考，是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未來可以繼續申論的課題之一。從這個角度言之，語言（方言）研究，不會只是著重於語言結構本身，而是其所分析的語言材料，同時能夠納入區域文化的範疇，並與該區域語言（方言）的使用慣性相互聯繫。

關鍵詞：澎湖群島、閩方言

一、論題的提出

澎湖群島閩方言的研究，自顧百里先生（1978）以來，儘管陸續有單篇的研究著作，由於學者們的研究動機，或以《彙音妙悟》為閩南方言古通語的基礎（洪惟仁 1992），或為同安方言的形成尋找論據（張屏生 1996），遂使得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僅僅為「印證」某些設想，以及「詮釋」《彙音妙悟》「音類」的輔助工作。換言之，儘管顧先生的作法、取材，仍有不少需要填補的空間，至少是第一位全然以澎湖群島方言為論題的研究者，其著作可為範式，

其功勞更不可沒。

爲了進一步探討三十年來澎湖群島閩方言的研究背景問題，我們有必要先行說明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的研究史略，以作爲對照。初步觀察臺灣閩南方言的音韻研究，可以發現「漳泉次方言分布區域」、「漳泉腔的語音對應」²，是歷來學者所重視的兩大課題。臺灣地區漳泉次方言的語音特徵及分布區域，根據目前學者們的調查成果（洪惟仁 1992：72-96）可以分成三類：

1. 偏漳腔：

1.陽平變調和陰平變調相同；2.陽入和陽去都讀中平長調，唯一的差別是陽入保存喉塞音，陽去沒有喉塞音；3.遇開三讀-i；4.山合一三，臻合一三宕合一三都讀-uiN；5.宕開三讀-iaŋ，語音 i□N。

2. 偏泉腔：

1.聲調有四個階，陰上聲讀高平調。2.聲調本變調組合計有八類，但目前只鹿港、福興、麥寮、台西等保存八聲，其餘都變成和漳州腔一樣，陽上、陽去混同，成爲七聲。3.入聲爲中升調。4.中古日、喻母字讀同來母。高元音-i，因不同區域而有-u、-□之別。5.有央元音-ə。6.有複元音-æe、-eo。

3. 漳泉混合腔：花蓮壽豐以南爲漳泉混合區。

其次，在臺灣漳泉方言語音對應方面（張振興 1993：27-32）則是呈顯四個音韻特點：

1. 泉漳個別字不成系統的例證：

1. i : e ; 2. au : io ; 3. iam : an ; 4. un : uan ; 5. uan : ian ; 6. i□ŋ : iaŋ。

2. 泉漳完全對應的例證：

1. o : □ ; 2. io : i□ ; 3. o□ : □□ ; 4. io□ : i□□ ; 5. iũ : iĩ ; 6. uĩ : uãi。

3. 泉漳部分對應的例證：

1. u : i ; 2. un : in ; 3. ĩ : ě ; 4. it : ik ; 5. ui□ : ue□。

4. 泉漳交叉對應的例證：

1. e : ue ; 2. ue : e ; 3. e□ : ue□ ; 4. ue□ : e□。

從上述的文字看來³，無論是洪先生，或張先生所提供的語音線索，確實對於我們調查研究臺灣閩南方言有著相當程度的啓發。然而，在前輩學者學術研究的基礎之上，我們必須追問的是：漳泉之外，現階段其他次方言的語音對應規律爲何？分布區域爲何？皆混併於漳泉之中？其混併的語言機制爲何？（老、中、青年齡層的差異爲何？）所謂「音腔」的區野，能否提供聲學實驗的材料？臺灣閩南方言各區域聲學實驗報告爲何？各次方言區域內部日常習語、詞彙或者語法表

述方式，是否具備足夠的語料進行分析？……這些零零總總的細部問題，都是我們必須去尋找答案的。問題在於，如果這些細部問題要獲得有效的處理，其策略必須先以臺灣地區的某個區塊，作為研究的基礎。澎湖群島較臺灣地區開發為早，且又受到南島民族，和不同歷史階段的漢人移徙，若以漢語方言學長年關注的「移民與方言形成」論題言之，澎湖群島當是臺灣地區閩方言踏查的第一步。

是以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有三：

1.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研究所遭遇的問題，含括方言與文獻語料的連結的基礎為何？研究者的語言史觀為何？進而音韻層面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為何？
2. 目前漢語史的基本設想皆是以「音韻」研究為本，何以詞彙、語法層面無法取得同音韻研究般的地位？為什麼研究者不採取同一批語料，或是同一地區，進行音韻、詞彙和語法的系統研究？其與傳統方法或方法論有何關聯？澎湖群島閩方言於詞彙、語法層面的拓展，能否提出新的研究模式？
3. 澎湖群島漁獵文化與該區域閩方言的聯繫研究，如何與其他學科整合出一個未來研究典範？其具體可行的研究路徑為何？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研究的可能問題與取徑

過去三十年來，以澎湖群島閩方言作為對象的研究者，約略有顧百里（1978）、洪惟仁（1992,）、張屏生（1996,2005,2006）、呂昭明（2007a,2008a.b.c.）。

澎湖群島閩方言屬性描述為何？若根據洪惟仁（1992：85）先生所言：

澎湖是泉州腔的大本營，尤其是同安腔最明顯。同安腔除了盛行於三重、蘆洲之外，當屬澎湖群島最具勢力。澎湖的同安特色顯示在他的遇開三一律讀-u，如：魚[hu]、豬[tu]、鼠[tshu]。十五音俱全，「入」、「柳」只有萬安、將軍不能分。除了兩個漳州村之外，有一些臺灣聽不到的奇怪發音。如：手指[tsin tshau a]、小指[be niu a]/[be niau a]（瓦硿）/[be ngiau a]（五德）/sio tsaiN（吉貝），罵[mi]、四合院的大房、二房的房[pang]，護龍的房間為[kan a]。

洪先生這段文字的說解，張屏生（1996）先生直接以「同安方言」範圍住整個澎湖群島閩南方言問題。不過細看這段文字，可以提出兩個問題：

1. 「同安腔」最明顯的論證依據為何？為什麼同安腔的特色在於中古遇攝今讀的區別？這是兩個必須提出的問題，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向來不重視「論證」，而重視「經驗」，只是調查研究本身並非倚靠經驗，便可以全然回答所有問題。

2. 語音對應 (phonetic correspondence)，是尋找語言層次的可靠依據⁴。但是，調查者所記錄的「音韻形式」，在異質性的語言環境中，僅僅仰賴中古音類為檢證依據，很可能所反映的只是我們「需要的答案」。次者，由於目前漢語方言調查者，鮮少運用實驗語音學的操作技術，遂使得方言調查所記錄語音問題，突顯出了語言學次學科間，雖各自發展卻是聯繫不足的缺失，這是我們目前從事語言調查者必須多所關懷的課題。至於，為什麼洪先生會說澎湖群島閩方言「有一些臺灣聽不到的奇怪發音」？一方面是方法運用上所造成的問題，另一方面，很可能與「島嶼」的區域屬性，有著密切的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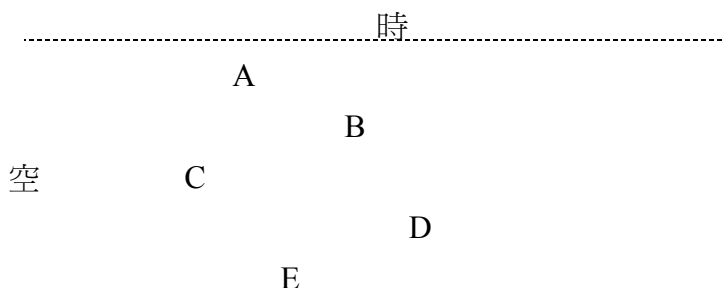
2-1. 澎湖群島閩方言與文獻語料聯繫研究的可能問題

閩南韻書《彙音妙悟》能否作為閩南方言共同語的基礎？這個問題可有兩點申述：一，高本漢 (karlgren) 以來的音韻史觀。二，高本漢音韻史觀影響下的漢語研究模式。先從第一個層次談起，漢語語言研究的研究模式，向來以歷史語言學的方法論為主流（這是高本漢以來音韻史觀的影響），在這種學術傳統之下，採取某部文獻語料，作為調查某種現代方言的依據，便成為一種很自然的取徑。問題在於，如何證明該文獻語料能夠與該方言「直接聯繫」？似乎很少有學者提出足夠的「論證過程」供我們檢證。第二個層次是，儘管從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一書發表之後，漢語音韻學正式脫離清儒訓詁、考證文獻語料的時代，進而落實於西方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之上。但是，漢語的歷史文化背景、閩方言的區域文化背景，能否全然以歷史比較法作為唯一解釋的論述基礎？顯然是必須深入思索的課題。

2-1-1 以《漢語方音調查字表》為調查依準的可能缺失

若以閩方言調查的觀念與方法而言，純粹以《字表》為主，在觀念上應無問題，但在方法上是不足的。最主要是直接採取中古後期音類與現代音值聯繫，忽略中古到現代各個時間階段的文獻語料。較為具象的說法可以藉由時空二維概念的圖像示之，請看【表 1】：

【表 1】漢語時空二維史觀



【表 1】內橫軸的「時」代表時間單位，縱軸的「空」為空間區域。A、B、C、D、E 分別代表不同時間、空間的文獻語料。目前漢語方言音韻調查研究法，採取以《漢語方音調查字表》，無疑忽略了從中古到現代「中間過程」當中，至少仍有 A、B、C、D、E……等等的文獻語料流布其間。我們的看法是，未能考量到近代漢語文獻語料，僅以中古《切韻》和現代方言的聯繫研究模式，是不完整的漢語史觀。

現代漢語音韻研究，以《切韻》「音類」作為音韻問題考量的「單位」，並非是起自高本漢。而是有宋以來學者間共通的思維模式，並以「尋找音韻單位」做為共同的問題意識。因此，即便我們採取直線式的漢語史觀，若能顧慮到近代漢語時期龐雜的語料，勢必需要調整某些設想，以便將這些文獻語料所反映的語言現象，納入整個詮釋系統當中。高本漢所從事的研究方式，所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發是：學者當自身進行方言調查，並與所理解的漢語文獻語料作一結合研究。換言之，高先生所採取的文獻語料是否合於漢語研究傳統？是另一個問題⁵。

2-1-2 閩南系韻書語料聯繫研究上的可能問題

閩南韻書，可以分為泉州、漳州、廈門和潮州系等類別（馬重奇 2001,2002）。許多學者採以作為研究泉州、漳州和潮州方言調查研究的基礎，這看來似乎「理所當然」的研究方式，卻隱含著兩個根本問題：其一，某韻書以某音系為基礎，再由調查某地區音系證明該書音系基礎，這便有「循環論證」的危機⁶。其二，這種方法，無疑是預設漳州方言、潮州方言、或泉州等等閩南方言，是由這批「文獻語料」演變而來，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設想。換言之，方法上是補足以《字表》為主的缺失，但是在觀念上卻無法交代上述的兩個根本問題。我們可以臺灣地區學者所依憑的《彙音妙悟》一書，其可能帶來的問題說明於次：

以《彙音妙悟》為共同閩南語的依據，真正的問題是在於「為什麼」以《彙音妙悟》為基礎？這部韻書的基礎方音為何？在這兩個問題皆未能充分提出論證過程的同時，便嘗試以《彙音妙悟》思考閩南方言問題，無疑認定現代閩南次方言是由《彙音妙悟》「演變而來」，這是個非常危險的設想。其危險性遠勝於高本漢以《切韻》為據，用以思考現代漢語方言問題。理由有五：

1. 目前的研究，無法說明為什麼《彙音妙悟》可與閩南方言各區域聯繫？
2. 由各區域族譜、日治時期人口普查，皆無法證明泉州人分布的確切區域，更無法證明泉州人為各區的大宗，小川尚義《台日大辭典》更顯示臺灣本島漳州人多於泉州人。換言之，以《彙音妙悟》為據，還必須解釋何以潮州、漳州、廈門等區域的文獻語料，為什麼不能與《彙音妙悟》「等位視之」，而必須被屏除在「共同閩南語」之外？
3. 今日所見閩方言區域文獻多是清代韻書（少數是傳教士所纂作），《彙音妙悟》更是晚於閩東《戚林八音》之後，何以如此晚期的文獻語料，卻可以視為「共同閩南語」的依憑？
4. 為什麼清末方有「共同閩南語」，清末之前，「共同閩南語」是否存在？如何證明？若無法證明其存在，這個「共同閩南語」很可能只是個「空概念」。
5. 我們無法排除這批清代的閩南文獻語料，個別音類間的「混併」是屬於「後期的變化」，換言之，閩南系文獻語料的個別問題，尚未取得具體共識之前，以任何一部文獻語料，企圖聯繫某個區域、某些區域的音韻問題，不僅無法切合歷史邏輯，更遑論音韻邏輯的有效性。

2-1-3 閩方言文獻語料整體研究的可能取徑

閩南方言，是閩文化連續體下的產物，果若我們孤立地談論閩南方言的語言問題，那麼，我們的思路便等同於高本漢將閩方言別立於《切韻》一般，會產生許多設想、解釋上的困難。針對閩方言島嶼區域文獻問題研究層面，有三個要點是必須仔細考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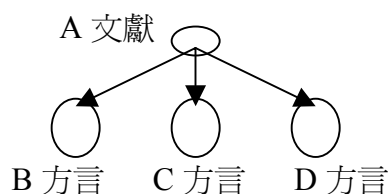
1. 「閩方言島」與「閩方言島嶼區域」是不同的概念。基本上，「閩方言島」所處的區域為非閩語，「閩方言島嶼區域」則是以閩語為主體的方言區域。島嶼區域「開放性的空間」，則是增加了理論設想的複雜度。因此，和其他漢語方言相較，閩方言除了文、白的問題之外，尚有內陸、鄰海和島嶼區域分劃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在閩方言島嶼區域內部皆無文獻語料傳承的情況下，單一文獻的聯繫，都隱藏著根本上的問題。

2. 漢文化植被不深的情況之下，閩方言的島嶼區域皆未有傳世的文獻語料。換言之，單純以某部閩方言文獻語料為調查的基本語料庫，研究者本身必須先提出「聯繫的論證過程」，否則其與島嶼區域閩方言「直接聯繫」本身是沒有任何意義可言的。
3. 現存閩方言文獻語料的整合研究，有助於觀察閩方言內區域音韻現象「推移」的規律與方向（呂昭明 2008a.）。這背後有三個因素：其一，漢語學者具有文獻語料的閱讀傳統。其二，閩方言文獻語料的「語例近似性」。其三，中古之後，《切韻》「音類」成為漢語學者間思考語言問題的「基本單位」。

2-2 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在方法論層面所遭遇的可能問題

「閩南方言」的概念，主要是依據歷史語言學「分群」(sub-grouping)原則之下所產生的說法。目前多數學者將閩方言分成閩北、閩東和閩南三個方言群，即是立基於此。臺灣漳泉次方言、文白讀的系統問題，或許應朝「區際聯繫」的方向進行思索，若是孤立島內的語言現象，很可能無法有效解釋該現象的形成機制⁷。在漢語歷史文化的脈絡下，當我們重新檢視閩文化有史時期的文獻語料，並透過整體、個別的比較，應仔細觀察其時空投射下，非直線式的發展史觀。前文（2-1-2）和（2-1-3）的內容，可再以概念式的思考簡化之，請看【表 2】和【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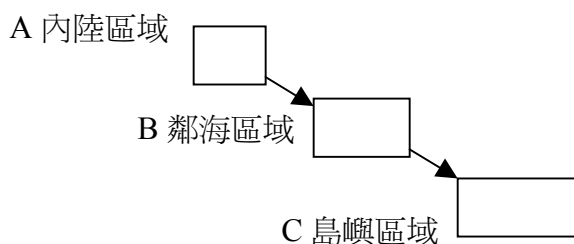
【表 2】單一文獻與多點方言演變關係圖



【表 2】指的是單一的直線式音韻史觀，以某部文獻材料，作為某些方言的調查語料，在方法論上便會造成【表 2】的系屬情況。請注意，歷史比較法的概念與此不同。歷史比較法，是先設想某個原始語言（proto-language），再逐步證明「分化」。【表 2】則是以某部已知為某方言韻書的材料（A 文獻），再用以調查該方言（B,C,D 三次方言），卻未解釋「↓、↘、↙」這些箭頭所代表的「演變關係」是如何成立的？「演變關係」為什麼可能成立？這兩個必須在研究之前先行回答的問題，卻在研究者有意、無意的忽略下受到漠視，因而造成邏輯上的「循環論證」。

澎湖群島閩方言在未有文獻語料可供整合研究的情況下，研究者便應當思考整個閩方言區域文化連續體的問題。若以音節結構為單位，漢語音韻史可以分為三期：上古、中古與近代。三個分期的音節徵性分別是：聲母發達時期、介音問題、韻尾與聲調問題。當我們將目前現存的閩方言文獻以及方言調查報告，依其區域排列（內陸、鄰海和島嶼區域），卻也發現如同漢語音韻史的音節徵性的發展，意即閩方言音韻類型的區域推移，彷彿一部縮略的漢語音韻史（呂昭明 2008a）。請看【表 3】：

【表 3】閩方言音韻類型區域推移的主要路線圖



【表 3】A、B、C 三區域的音韻現象，在區域內部都是各自成系統的，因此，我們可以說 A、B、C 區域音韻的推移，是類型的推移。如何再以實際的例證，說明【表 3】閩方言各區域音韻類型「推移」的問題是個合理的預設（presupposition）？這是下文想要繼續說明的問題。

2-3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與語言地理學的聯繫

澎湖群島是屬於閩方言的島嶼區域，同樣屬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的馬祖列島，何以不是以閩南方言為主體？恐怕不是歷史比較法所能解釋的。尤其採取直線行的音韻史觀，研究者所見與所忽略的問題很可能是等量的。澎湖群島閩方言-io 韻母類型，或可比較出歷史語言學和語言地理學兩個學科，處理空間區域語言問題時，其理論學說解釋效力的強弱。洪惟仁先生（1992：85）言及澎湖群島閩方言□io 韻母時，留下了這一段說法：

湖西鄉的發音特別奇怪，所有泉州的○都讀成 io，像「天烏烏、卜落雨、刳豬反豬肚……」那句童謠，他們讀成 thiN' ió ió, bǒ ló hió, thài tú pań tú tió ……，

除了「天」、「𪔐」之外，所有的韻母都跟臺灣不同。他們自稱是漳州人，推測來自長泰。

這段描述文字的背後，同樣有兩個問題需要仔細探討：

1. 為什麼以語音對應的觀察言之，泉州：湖西呈顯出 $\text{ɔ} : \text{io}$ 的對應，能否以歷史比較法解釋之？
2. 「自稱是漳州人，推測來自長泰」的說法，是如何論證出來的呢？

關於 $[\text{io}]$ (或 $[\text{iɔ}]$) 的音讀形式，自 Douglas 以來，是許多學者所關注的問題，請看 Douglas (1899: 173) 有言：

io, in several tones, used in Tiô-thoà and koàn-kháu for A. ə ; e.g. "black"

以 $[\text{io}]$ 作為「黑」韻母的音讀形式，目前可見於澎湖群島馬公市與湖西鄉鄰接區域，以及虎井里和湖西鄉各區域。Douglas (1899: 608-612) 進一步提到：

……Tung-an (T.) or Tâng-oa 𪔐, though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district in which Amoy stand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district of the department or prefecture of Chin-Chew, has yet a very marked variety of dialect for itself. It is said to have originally belonged to the prefecture of Chang-Chew, which may perhaps partly explain its peculiarities. In many points it is more or less similar to the Chin-chew,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are the chief variants (1) ai 𪔐 (2) Kwan-kow or Koan-khau (K. or Kk) is a part of Tung-an district, near the island of Amoy. Among its special peculiarities use are the frequent use of *io* instead of *T*,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u* for *i*. These peculiarities are said to be shared by the dialect of Tiô-thoà referred to above under Chang-Chew. But the use of *u* for *i* in some words is also found in many parts of Tung-an and even in the villages on Amoy island.

這段文字包含了至少三個問題：

1. 以地理區域而言，Douglas 注意到閩南方言「島嶼區域」和同安部分方言點具有 $[\text{io}]$ 的音讀，但是，其行文似乎仍雜有「推測」的意味。
2. 雖然皆以 $[\text{io}]$ 為音讀形式，可是其中古條件是否皆同，是鄰接區域接觸影響？還是為相同音韻條件的變體？Douglas 所作的觀察，留下了繼續探討的空間。

3. 洪惟仁先生所言「自稱是漳州人，推測來自長泰」的說法，究竟有無具體實證？同樣是需要進行論證的。我們可以再參較大陸閩南方言學者的相關看法，諸如黃典誠（1994）談到：

長泰話是個缺乏[-o]的土腔。凡漳州、廈門說為[-o]的，長泰悉代之以較[-o]為開的[-ɔ]。因此漳廈說「好」[hó]，長泰說[hɔ]，漳廈說「虎」為[hɔ]，而長泰卻說「虎」為[heu]（ieuo 相當中古遇攝一等）。這都是方言內部的對應規律。長泰沒有[-o]，也應無齊齒的[-io]，理所當然，凡漳廈說為[-io]的，長泰一律說為[-iɔ]，喉塞音的入聲隨之而變。因此「猪腰」是[tí-iɔ̌]，不是[tí-ió]，「過橋」是[kue□-kió] 不是[kue□-kió]（iɔ 相當中古效攝三四等白讀）

另外，林寶卿（1994：3）同樣言及長泰與廈門、漳州泉州的音韻形式問題，徵引於次：

長泰話在語音、詞彙和語法方面和以廈門為代表的閩南方言大體相同，但又有自己的某些特色，如語音方面韻母 ēu，長泰常流傳著押 eu 韻的一首童謠：「天烏烏（eu），卜落雨，擲鋤頭，巡水路」。又長泰沒有 o 韻，中古果攝開合口一等字文讀音，如左、歌、何，效攝開口一等字文讀音，如寶、刀、高多數讀同泉州 oo，廈門漳州讀為 o（個別讀 oo，如我、火、貨），中古果攝來自上古歌部，上古歌部擬音 a，中古的 a 類包括開口的歌韻和合口戈韻，廈門漳州讀 o，是元音高化了。而長泰、泉州尚未高化到 o，只到 oo 階段，這也是古音的保留。

至於周長楫（1998）亦言及廈門市郊灌口、馬鑾、海滄一帶的農村，遇攝合口一等「虎、哺、步」為[-io]，廈門市區則為[-ɔ]，遇攝三等在廈門市區為[-i]。

很顯然的，根據黃、林、周三位先生的說法，顯示長泰、廈門的音讀形式及其來源，並不等同於澎湖群島-io 韻母類型（廈門市郊的農村遇攝一等的音讀，其成因恐與閩北方言推移亦有所關聯）。從上述的證據看來，推斷澎湖群島湖西鄉民為「來自長泰」的說法，恐怕是站不住腳的，至於是否為漳州人？仍有待論證。不過，從方法論的立場而言，便是直線式音韻史觀下，一以貫之所呈顯的解釋效力的不足。為什麼？我們繼續申論之，請看下列兩張簡表【表4】、【表5】：

【表 4】澎湖群島閩方言中古遇攝韻母今讀形式的部分語料

	補	布	步	兔	醋	姑
(1) 馬公 東衛	pɔ̃	pɔ̃	pɔ̃	tʰɔ̃	tsʰɔ̃	kɔ̃□□
鎖港	piõ	piõ	piõ	—	—	—
虎井	piõ	piõ	—	—	—	—
(2) 湖西 林投	piõ	piõ	piõ	tʰiõ	tsʰiõ	kiõ□□
隘門	piõ	—	piõ	—	tsʰiõ	kiõ□□
(3) 白沙小赤崁	pɔ̃	pɔ̃	pɔ̃	tʰɔ̃	tsʰɔ̃	kɔ̃□□
港子	pɔ̃	pɔ̃	pɔ̃	tʰɔ̃	tsʰɔ̃	kɔ̃□□
中屯	pɔ̃	pɔ̃	—	tʰɔ̃ɔ̃	—	—
(4) 西嶼 竹灣	pɔ̃	—	pɔ̃	—	tsʰɔ̃	—
外垵	pɔ̃	pɔ̃/pɔ̃	—	tʰɔ̃	—	kɔ̃□□

	苦	虎	戶	豬	鼠	薯
(1) 馬公 東衛	—	—	hɔ̃	tu□□	—	ɬú
(2) 湖西 林投	kʰiõ	hiõ	hió	tu□□	tsʰu□	tsú
隘門	kʰiõ	—	—	tu□□	tsʰu□	tsú
(3) 白沙小赤崁	kʰɔ̃	—	—	ti□□	tsʰu□	tsú
港子	—	hɔ̃	hɔ̃	ti□□	tsʰu□	tsí
中屯	kʰɔ̃	hɔ̃	—	tu□□	tsʰu□	tsú
(4) 西嶼 竹灣	kʰɔ̃	hɔ̃	hɔ̃	ti□□	tsʰi□	tsǐ
外垵	—	—	—	tu□□	tsʰu□	tsú

【表 5】閩方言內陸區域石陂、建甌⁸中古遇攝的今讀形式

	補	布	步	兔	醋	姑
石陂	biõ	pió/pú	bú□	tʰú	tsʰú	ku□
建甌	pu 文/piɔ 白	pu 文/piɔ 白	pu 文/piɔ 白	tʰu	tsʰu	—

	苦	虎	戶	豬
石陂	kʰũ	kʰũ	xú□	ty□

建甌	k ^h u	k ^h u	xu	k ^h y
	居	去	魚	許
石陂	ky□	k ^h y	ŋy	xỹ
建甌	ky	k ^h y 文/k ^h ɔ 白	ŋy	xy

	蛛	柱	樹	雨
石陂	—	t ^h iu□	—	xy□/hỹ
建甌	tsy 文/ty 白	tsy 文/t ^h iu 白	sy 文/ɬ ^h iu 白	y 文/xy 白

【表 4】是澎湖群島閩方言部分方言點，中古遇攝字的部份語料；【表 5】則是閩方言內陸區域石陂、建甌（學者多視為閩北方言）中古遇攝字的語料。兩相比較，可以立刻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相同的中古條件之下，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方言內陸區域的石陂、建甌（白讀），會呈現出相同、相近的音韻形式（ɔ、o 皆屬於後高元音，且音位相鄰）？很明顯的，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會是單純對應的比較研究，所能合理解說的。為什麼？

其一，以貫時角度言之，【表 4】、【表 5】今讀為[-io]或[-iɔ]的形式皆為遇攝一等字的條件，原先，中古遇攝一、三等的區別在於三等具有-j-介音，倘若以此將遇攝三等構擬為[*-jio]，恐怕仍必須解釋中古一等為[-o]，三等為[-jo]（此處不計開合口的區別），今讀形式為[-io]的「演變條件」為何？

其二，以共時角度言之，倘若將[-io]或[-iɔ]的形式視之為「音韻變體」(variant)，則又必須解釋為什麼相距千里的區域，何以能夠出現相同、相近的「變體」？其形成原因、機制為何？

面對上述兩個問題，果若朝向「共同脫軌」的學說尋求可能的解釋，語言地理學所謂「文化中心推移說」的論點，很可能能為這個語言現象，找到解答的窗口。為什麼？我們可以三點補充說明，如次：

1. 閩方言文化區域，自唐以來以閩東為中心，從而向北、向南進行文化擴散，終至形成閩文化連續體的環流。臺灣地區的閩方言研究，重視漳泉次方言的影響力應該是對的（這背後有近代移民的史實為證），但是以漳泉次方言範圍住整個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的研究，很可能讓許多語言現象，成為需要排除的例外。我們今日對於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的認識是建立了，可是在細部的層面上，恐怕仍有許多的枝節問題有待釐整。

2. 閩方言島嶼區域的劃分，可有遠陸、近陸之別。相較於其他的漢語方言，在理論設想上不需考量島嶼區域可能問題的情況下，研究閩方言、閩南方言的語言問題，便需要相對謹慎。澎湖群島處於中國大陸、臺灣的區界，不僅需要考慮歷史上向左、向右移民「來回返復」的可能問題，島內聚落的散置性、封閉性，同樣很可能是保存古老語言特點的重要因素。
3. 閩方言島嶼區域歷史移民史料、族譜材料的可能侷限，在於殘缺以及不完整。如果研究者又僅以漳泉方言考量臺灣地區方言問題，那麼，澎湖群島和距離千里之遠的石陂、建甌，其語音對應的關係是不可能得出合理解釋的。從漢人移民歷史的主線推之（尚有兩種以上移民動線的設想，請參看呂昭明 2008a），-io 韻母的存在，證明了閩方言語音的區域鍊動（Chain Shift），由閩方言內陸區域往島嶼區域「推移」而沈積下來。

三、澎湖群島閩方言詞彙、語法研究層面的拓展

關於澎湖群島與臺灣地區閩方言詞彙的殊性與共性，洪惟仁（1992：86）先生曾有如次的這段話：

澎湖並不是全區都是泉州腔、同安腔，也有明顯的偏漳腔，如赤崁及對岸的吉貝島，幾乎不受本縣其他地區的同安腔影響，連宜蘭的「酸酸軟軟 suiN nui」、「食飯 puiN配鴨卵 phuẽ ǎ nuí」都可以在此聽到。

這段文字談到了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複雜性，何以澎湖群島會存有近宜蘭的詞彙？由於洪先生所提供的詞彙僅此二例，很難推估其影響源是否由宜蘭方言而來？或是所調查的發音人曾到宜蘭工作與否？進而討論是否由澎湖群島閩方言擴散至宜蘭？這些問題都有待我們日後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

3-1 臺灣地區閩南方言詞彙調查的三個問題

現在，我們需要聯繫思考的是，洪惟仁等先生（1991,1992,1993）調查臺灣各區域閩南方言時，所使用的詞彙項目，請看【表 6】：

【表 6】臺灣閩南方言調查詞項簡表

新衫	破衫	熨衫	借衫	洪衫	厚衫	舊衫	俗衫	白衫	新米	洗米
碎米	北美	借米	無米	有米	舊米	俗米	白米	新厝	起厝	破厝
蓄厝	借厝	無厝	有厝	舊厝	俗厝	白厝	烏色	紫色	退色	漆色

肉色 無色 有色 面色 綠色 白色 新冊 好冊 教冊 借冊 無冊
 有冊 舊冊 讀冊 活冊 新鞋 破鞋 拭鞋 刺鞋 皮鞋 雨鞋 舊鞋
 俗鞋 白鞋 風雨 小雨 細雨 沃雨 潑雨 淋雨 厚雨 大雨 浞雨
 落雨 新字 寫字 細字 捌字 無字 有字 大字 別字 白字 輕力
 省力 氣力 出力 借力 無力 有力 大力 實力 食力 生食 好食
 勿食 乞食 無食 有食 大食 乏食 學食 開開 圓圓 厚厚 大大
 直直 白白 扁扁 濕濕 幼幼 闊闊 山東 振動 運動 輕重 山洞
 堅凍 姓董 動手 重擔 凍霜 董事 老 漏 老人 流膿 落屎
 流水 漏水 落水 教授 菜刀 顛倒 飯桌 水道 桌頂 倒水 刀店
 倒店 道德 有空 永遠 今晚 開開開 乖乖乖 金金金 霏霏霏
 圓圓圓 長長長 厚厚厚 恬恬恬 大大大 白白白 薄薄薄 直直直
 實實實 俗俗俗 死死死 扁扁扁 凜凜凜 濕溼溼 漉漉漉 幼幼幼
 對對對 細細細 闊闊闊 肉肉肉 搭搭搭 過去 驚死 無去 做儂
 阿珠 阿蘭 阿狗 阿賜 阿樹 阿德 阿伯 阿達 阿石 輸了 贏了
 跑了 去了 糟了 懂了 很便宜了 戲演完了 發財了 真的 假的
 大的 小的 綠的 藍的 紅的 生的 熟的 死的 活的 厚的 薄的
 銅的 鐵的 金色的 銀色的 起來 爬上來 上去 出來 跑出來
 出去 衝出去 走吧 回去吧 回家吧 過來 爬過來 過去 跳過去
 下來 剝下來 下去 坐下去 進來 進去 金仔 柑仔 溝仔 椅仔
 狗仔 鋸仔 稱仔 印仔 絃仔 猴仔 蟬仔 樹仔 袋仔 竹仔 桌仔
 鐵仔 鴨仔 夾仔 賊仔 蓆仔 藥仔 石仔 柑仔汁 椅仔跤 印仔店
 樹仔尾 竹仔厝 桌仔頂 藥仔店 日頭 二十二 富裕 豆乳 朋友
 切菜 手銃 慢慢 懶懶 楞楞 命令 馬上 毋好 毋但 毋免 明明
 冷冷 憨憨 漿糊 糕仔 蚵仔 秧仔 腸仔 竹膜 家庭 請假 碼頭
 差不多 閃電 奇數 雙數 拿鋤頭 厝瓦 寒熱 旱災 依賴性 忍耐
 壞人 奇怪 拐杖 揩巾 揩孩子 揩書包 舒服 菜葉梗 關門 橫的

【表 6】尚有許多詞彙未列出，但是皆可含括於下列的三個問題之內，我們逐步說明於次：

1. 這些使用的詞彙能否作為「同源詞」？以現代用語作為臺灣閩南方言各個區域比較的基準，理由為何？

2. 這些語料能否代表該區域的基本詞彙？能否與該區域的區域文化聯繫？
3. 為什麼音韻調查以《彙音妙悟》的語料為主，詞彙層面的調查工作卻以現代口語為依準？

針對第一個問題，所謂同源詞的研究，一般是論及上古漢語音韻問題時，才會提到的術語，其內容大體是「words or other linguistic entities that we can trace to a common source we call cognates」(Lehmann 1973: 120)。**【表 6】**這批調查時所使用的詞彙，顯然未經過嚴格篩選，從歷史語言學的操作程序看來，目前臺灣閩南方言詞彙的研究，很可能還停留在研究者所認知的詞彙的階段。

至於第二個問題，所要談的是研究者所認知的常用詞彙、該方言區域日常習用詞彙、該方言區域的基本詞彙以及某個群的方言內部的共通詞彙，是屬於四個層次的問題⁹。問題的癥結在於現行的諸多研究成果，並未截然區劃出四者之別，甚而混同四者的差異，以至於為何記載某個詞彙，或是為什麼這些詞彙可以作為比較研究的素材？皆未有隻字片語的解說。從教學的立場看來，這些區別或許無有妨礙，只是長期下來慣性的思考方式，卻無形當中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思維策略。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漢語方言學的研究層面，音韻、詞彙和語法研究，至今仍是分立的三個介面。在本文(4-3)節，我們會以澎湖群島閩方言身體部位詞彙(歷史語言學所言的「基本詞彙」)，其與區域文化的聯繫，持續說明我們所體認的詞彙調查問題¹⁰。

第三個問題，臺灣地區閩方言音韻、詞彙研究上，研究者所採取的立場是有衝突性的。更為擴大的談，漢語方言學的研究，目前有一個共同困境，即是詞彙、語法的研究，尚無法開展出如同音韻研究的系統性，因此要聯繫語言結構的這三個側面仍相當程度的困難。其實，這個問題出自於漢語方言的研究模式。學者們普遍的立場皆是以歷史語言學的觀點，思索漢語的形成與演變問題，而其方法論中，「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和「內部擬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是兩個基礎原則。在比較法的研究模式下，音韻形式的對稱性(correspondence)和語音規律(law of phonetic)則可做為檢證的基礎，為的仍是尋找語言演變的合理解釋。無論如何，僅能說明學者對於音韻研究方法，雖有一定的共識，但是這個共識目前尚且無法延伸至詞彙、語法的研究。

3-2 澎湖群島閩方言基本詞彙與語言地理學理論的啟發

關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詞彙層面，語言地理學的理论框架，似乎較能說明歷史比較法所無法解釋的語言現象，為什麼？請先看**【表 7】**：

【表 7】澎湖群島人稱代詞「誰」與鄰近區域的結構類型

詞彙形式	澎湖群島內部方言點	閩方言內部區域方言點
A. tsui□□ á tan□tsuí	白沙瓦硐	漳平永福方言
B. ti□ lan□	白沙赤崁	東山島 ti□iē四甲
C. tian□	馬公、西嶼、望安	海口、遂溪
D. tan□	西嶼小門村、竹灣村	
E. tēian□□	馬公興仁里、烏崁里	
F. tan□ a□	花嶼、七美海豐	

【表 7】是以澎湖群島閩方言人稱代詞「誰」的概念，所整理而出的。其中可有兩點說明：

1. 為什麼閩方言內陸區域的漳平永福方言，與白沙瓦硐村，會以相近的詞彙形式表達「誰」的概念？為什麼同樣屬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海南島海口方言，與澎湖群島閩方言「誰」的概念的詞彙形式是相同的？次者，「誰」的概念在 D.E.F 三種形式，又該如何解釋？前文我們言及澎湖群島閩方言-io 韻母的成因，是受到地理推移的因素。事實上，瓦硐與閩方言內陸區域漳平，皆以「tsui」的詞彙形式表達誰的概念，是以推移解釋語言現象的另一項證據。而海南島與澎湖群島閩方言「誰」概念的詞彙同形，則可假設兩個區域歷史階段的某個語言層次是相同的。至於 D.E.F 的形式，與鄰接閩方言區域的關係為何？則有待未來的持續研究，特別是澎湖群島最西側的花嶼。
2. 若以語言地理學的理論而言，似乎用以解釋澎湖群島閩方言「誰」概念的地理分布，較之以「演變」(derivation) 的解釋策略來得更具說服力。

3-3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詞彙、語法的聯繫研究

關於閩南語語法研究層面，楊秀芳先生(1991)、李如龍先生(2007)的範式，對於我們的研究自然是極具啟發性的。我們不僅需要接續探究，並且應該進一步思考方言區域內部語法的「表述模式」(descriptive model)。為什麼？主要的理由有三點：

1. 目前漢語語言學內部的發展，漢語語法史與漢語音韻史的分期仍無法一致，上古、中古漢語語法的分期界線為「東漢」(梅廣 2002)，上古、中古漢語音韻的分期則以「唐代」為界線。這是採取文獻語料為主線所做的漢語史分期的觀

察。透過不同方言區域語法詞序、類型的比較，能否為漢語語法分期找到更妥適的分期界線？或許是應該嘗試去進行論證、建構的。

2. 閩南區域方言語法研究、閩南語語法研究，語法分析語料的擇取應該是不同的。閩南語語法研究的語料、例句的擇取，或以閩南語為母語的發音人即可，包含研究者本身。然而，若要針對某個閩方言區域、閩南某個次方言區域進行語法研究，那麼，研究者對於該區域方言相關背景的準備，可能來得複雜，從這個角度推之，我們應該暫時脫離漢語內部教學語法、理論語法的分別框架（王力 1956），朝向建立起各區域詞彙、語法語序的對應關係，因為這個研究課題很可能是解答閩方言內部音韻、詞彙和語法如何發展演變的前提與關鍵。
3. 研究者所體認的「方言語法通則」，與實際上到該方言區域調查個別詞彙、語法的「表述模式」，同樣是必須分開研究的。

在上述三個理由之下，對於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詞彙和語法聯繫的研究策略，同樣可有三點說明：

1. 個別發音人和聚落發音人：

以往臺灣閩南方言調查，或以某個區域一、二個發音人為代表，或選擇籍貫為某地的發音人，作為該區域方言研究的代表，這其中隱含著「代表發音人」的代表性為何的問題。朱曉農（2005：47）亦曾談到：「……語音學研究表明，即使同一個人把同一個語言信號說兩遍，物理性質都有可能很不一樣。不同的發音人在實現同一個音韻類，或某個音韻對立時的發音策略可能很不一樣」是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¹¹。在尚未採取實驗語音學策略研究澎湖群島閩方言之前，我們認為未來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的第一個策略，應以聚落（settlement）為中心，尋找同一聚落年齡層相近的發音人以為群組（請注意，這與「同一語言社群」的定義並不同）。這個作法可以讓為數較多的個人方言先行比較，次者可以檢證「共同存古」、「共同創新」和「共同脫軌」的論說，並找到合理解釋的依憑，這對於「重建」（Reconstruction）澎湖群島閩方言的古語系統，也很可能會帶來一定的助益。（閩方言島嶼區域皆未有文獻語料的情況下，我們或許可先行貫徹歷史比較法，全面「重建」該區域的古語系統）。

2. 同一主題故事的語法表述：

運用故事方式調查方言，是起自趙元任先生（1928）。隨後，羅常培（1930）、董同龢（1967）等先生們的著作，可以發現相同的操作方式。以同一主題故事，作為同一聚落發音人共同的議題，可以搜羅相同概念下的不同詞彙，同時，對於同一、相近事件的表述模式，成為該區域方言語法研究的重心。從這個角度而言，

或許才能有效掌握音韻、詞彙和語法的「整體運作規則」¹²。過去閩方言音韻、詞彙和語法研究，語料「選擇」、「分析」各異的情況，將有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同時，音韻、詞彙和語法在「語料系統化」的作法之下，統整的論述三者間的語言現象，或許可以進一步了解到閩方言各區域語言結構的活動機制，從而建立起更系統的框架。這是未來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研究的第二個策略。

3. 詞彙和語法類型推移研究：

初步觀察漢語音韻史的理論發展，可謂歷經五個階段：一，高本漢時期、二，普林斯頓學派(Princeton School)時期、三，張琨先生漢語時空兩個維度(dimension)的文獻關懷、四，橋本萬太郎先生的文化區域與推移理論、五，徐通鏘先生以「文白異讀」建構漢語的歷史語言學。這五個階段的理論影響，時至今日，仍可作為概括漢語語言研究者意見分歧的主因。平心而論，除了橋本先生的推移理論涉及漢語詞彙、語法的研究外，其餘四種學說都是立基於音韻層面的考量。很顯然的，我們有必要進入方言語法的研究範疇(category)，尋找音韻、詞彙和語法可能的聯繫出口。

目前漢語方言語法調查，可以朝哪些面向進行？余藹芹(1988：26)先生談到：

……在語法領域裏，我們急切需要調查各方言的主要語法結構。方言裏有哪些主要的問句？哪些被動句？哪些存現句式？哪些祈使句式？哪些雙賓句式？哪些雙主語句？哪些比較句式？哪些判斷句？哪些否定句？哪些可能式？哪些情貌系統？哪些語氣系統？哪些主題變換法？哪些修飾結構？哪些時間結構？空間結構？哪些詞序？哪些重疊法？哪些與語法有關的變調方式？……對以上的每一個問題，我們都還沒有答案。

面對余先生二十年前的觀察與提問，檢視現有的閩方言調查報告，試問能否提出具體而成系統的答案？進而言之，除了調查各方言主要語法結構之外，該如何整合思索不同區域方言語法的共性問題？針對這個問題，橋本萬太郎(1987：47)先生對於漢語南北方言語法類型的考察工作，提供了進一步的範例，先生談到：

漢語南北方言在被動態標誌上最顯著的區別是：使動—被動兼用只限於北方，而南方確保有著“給”或由其同義詞轉化來的被動標誌。這很明顯地聯繫到東亞大陸南北方非漢語被動結構。南方語言大半保留著“給予”—被動兼語式，而北方兼用使動—被動標誌。……從宏觀觀點查看亞洲語言結構類

型的地理推移，漢語南方方言和南方非漢語各語之間的結構關聯是絕不能否認的。那麼在這個被動式南北結構推移上，我們也可以看出現代漢語結構的一種阿爾泰化。

從橋本先生這段具有高度啓發性的文字看來，漢語方言語法研究，絕不能滿足於研究者自行造句、分析的層級。應該朝向「區域方言」語法比較的方向深入，而我們認為區域方言語法調查的最小區域單位則是「聚落」¹³（Chang 1972, Tsang 1992）。這是未來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與研究的第三個策略。

四、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其區域文化

初步審視目前漢語方言調查報告，可以發現共性遠多於殊性，這種現象是人為的忽略，還是各區域文化本具有高度共性？這個問題恐怕值得仔細深思。關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區域文化的聯繫問題，我們認為有三個學說可以作為思考的基礎：

4-1 畜牧、農耕類型語言學說（橋本萬太郎 1978）

畜牧、農耕類型語言結構的分劃，在理論上可有漢人生活文化發展的基礎支撐。除此，橋本所提供詞彙、語法面向的證據，同樣促使我們必須更深入思考語言與文化整合研究的課題（呂昭明 2008）。

橋本萬太郎（1978）先生認為透過區域空間談論語言問題時，便會呈顯出歷史比較法的侷限性，其說法如次：

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の話し手の経済の中核をなしたのは、古代から地中海を中心とした通商であった。してみると、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で、数詞が親族名称のようなものよりも安定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も、なにもそれが基礎的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理由によるのではなく、この地中海を中心とする通商圏を維持させるために不可欠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という簡単明瞭な必要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マライポリネシア語族と総称される言語の話し手が、西はインド洋西端のマダガスカル島から東はポリネシアのハワイ群島まで、南はメラネシアから北は台湾（もしかしたら朝鮮半島南端の伽）までという、当時の航海術の常識では想像もつかないような広大な地域の拡がったのは、これと関

係があるのであろうか。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のように急速に拡がって、各地で孤立して発達してきた言語を除けば、農耕民型の言語は、その中心の言語による同化と不断の借用関係のために、その同化のメカニズムと過程を解明することなしには、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について成功したような、比較方法による祖語の再構は非常に困難である¹⁴。

透過這一段文字所給予的啓示，我們不難想像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語言問題，很可能不像鄰海區域與內陸區域相對單純，以閩文化由北而南的主線看來，不同階段漢人、非漢人的文化沖積，致使島嶼區域成為不同語言成分來源擴散疊置（overlapping）的場域。前文所論述的澎湖群島閩方言-io 韻母類型，以及人稱代詞「誰」的概念的詞彙形式，皆可用以證明這個設想（presupposition）的合理性。

4-2 海洋民族學學說（西村朝日太郎 1974）

以美國語言學的歷史發展而言，早期的 Sapir、Whorf 等學者，都是具有人類學、語言學者雙重身份的，或許正是這個因素，所能看到的問題點便相較為多。在進行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的工作過程中，儘管意識到橋本先生「漁獵」類型語言的可能性，若要能夠完整建立這個學說觀點，仍需要其他學科的參照研究。以漁獵文化的角度切入澎湖群島閩方言，則海洋民族學的學說觀點，可為漁獵類型語言的設想，提供了理論層面構想的基礎。西村朝日太郎（1974：15、17、26、67、168）先生所言的下列文字，是極富啓發性的，徵引如次：

このように漁民が同一の言語文化共同体の中においてさえ、はつきり農民と差別されているのは日本だけの現象ではない。イベリア半島の海岸地方では特殊な純漁村を除いて、漁民は港近くの貧民街に住み、隣接者と伝承、慣習、習慣を非常に異にするばかりか他の集団に対する違和感も強い。したがって漁民は周囲の住民とあまり接触せず、通婚関係の結ばれていることも稀である。……さらに、地中海東方や南アジアにおいても、漁民共同体は異質の集団を形成している場合が少なくないが、中国においても同様の事実のあったこと文書にみえている。……さて一番原初的な漁獵や狩獵を営む民族は、採捕民族（Wildleuter）というドイツ語の概念で示されるであろう。かれらは最も素朴な文化を有する民族で、経済学的な意味におけるいかなる形の再生産も行わず、ひたすら海の幸、山の幸を奪いに奪うという掠奪経済を営む民族の謂いである。……漁撈活動の物質的基礎である

漁具の形態、機能とも、止水、流水のいかんを問わず、水という流体の諸性質を考慮に入れねばならない。

……自給經濟の段階における漁撈活動は沿海漁撈の域を出ることは稀であるから、その活動は勢い帯狀的性格を帯びてくる。これは河川の場合も同様である。海岸線および河川はまた特に未開地においては、きわめて重要な交通路でもあるから、漁具の急速な伝播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一例を挙げると、北米西部のインディアンの高原文化域においては唯一の大河系に水産物、特にサケが集中しているので、この地域の部族群は、サケの移動と共に移動する。かれらの生産手段である漁撈技術体系は複雑で漁柵、築、引網、突刺具、掬網等の種々の漁具を用いているが諸部族群を通じておおきな類縁性が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る。

生態学的条件が許す限り、漁民が農耕その他の生産活動に従事するのは、一つは食物における動植物の均衡を保つためと、一つは漁撈の周年稼行が不可能である場合が多いからである。すなわち、魚の洄游その他の関係で漁撈には周期があつて、漁民もこれらの自然的条件には従わねばならない。¹⁵

西村先生所言及的這段長文，有助於我們接續橋本萬太郎先生所提出「畜牧」、「農耕」型語言類型的主張，從而設想「漁獵」語言類型學說的可能性。

澎湖群島由「漁民村」、「漁業村」所組成，各聚落內部生活早期皆自給自足，在物質條件不充裕的情況下，居民互助是各聚落生活圈形成的主因，老弱、婦孺若無交通工具，於聚落內的時間是相對為長的，年輕男性族群，雖多從事海上漁撈工作，然而受限漁船、漁場以及聚落內部語言環境的「封閉性質」，使其存古，亦即語言地理學所言之「邊境殘存」。不過，「邊境殘存」的概念，是大陸板塊為核心的概念而來，進而言之，「島嶼區域」所承受的「語言殘存」，因其「開放性空間」而產生多向來源的可能性，而此多向來源的特性，會因其「鄰接區域」，亦即與鄰海區域的遠近，而產生不同的效應。為什麼？澎湖群島是漢語閩方言的島嶼「遠陸島嶼」，與其相對的金門、東山島和海南島皆屬於「近陸島嶼」。距離的遠近，固然影響語言擴散波長的強弱，然而，澎湖群島的「島嶼散列」，或許才是造成語言分散疊積的主因。

4-3 方言區域史學說（丁邦新 1992）

為什麼我們認為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研究，可以嘗試朝漁獵型語言類型理

論的層次邁進？丁邦新（1992：23）先生所提出「方言區域史」的觀念，可以作為第三個層面的補充，請看：

漢語方言史是研究一個漢語方言形成的歷史；而方言區域史則是以現在或古代某一個方言區為對象，研究那一個區域從古到今方言之間演變接觸的情形。

面對丁先生的說法，我們認為除了方言區域與「外部」接觸演變的情況需要釐清外，同樣需要正視方言區域「內部」語言現象的對比分析。若以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詞彙現象的地理區域為例，請看【表 8】：

【表 8】澎湖群島閩方言身體部位詞彙及其地理分布

	東衛	竹灣 ¹⁶	小赤崁村
額	—	t ^h au ¹ hia□□	—
膝蓋	—	k ^h aʔ t ^h au□□ uan ¹ a□	—
大腿	k ^h aʔ lian ¹	—	—
小腿	k ^h aʔ au toʔ□	kaʔ tĩ a□	ien ¹ a□ toʔ□
肩	—	kan ¹ t ^h au ¹	—

「身體部位」以及前文所討論的「人稱代詞」，學者一般皆視之為語言中的基本詞彙，同時是歷史比較法的主要依據。根據語言地理學所提出「基本詞彙固定說」的設想，【表 8】將澎湖群島馬公東衛、西嶼竹灣和白沙小赤崁，三個區域方言的身體部位詞彙進行比較。可以提出兩點以續論述：

1. 「膝蓋」一詞，竹灣村[k^haʔ t^hau¹ uan¹□ a□]，同樣可以分成兩個部份解析：[k^haʔ t^hau¹]是第一成份，[uan¹ a□]是第二成份。第二成份帶有「曲」、「彎」的意味，第一成份顯示「膝蓋」如同「屬於腳的頭部位置」。
2. 「小腿」一詞，其詞彙形式所反映的是區域性的「語言認知」，而這種區域間對比的差異，我們應該特別重視，何以故？馬公市東衛稱「kaʔ au toʔ□」，是以小腿的「位置」區分，即「腿」之「後部」。西嶼鄉竹灣稱「kaʔ tĩ a□」，是因其「肥腫」同「豬仔」一般，所形成的說法。至於白沙鄉小赤崁村的「ien¹ a□ toʔ□」則是形容小腿，如當地「ien¹ a□ hí」（煙仔魚）般肥嫩¹⁷。同一個詞彙概念，卻又涉及到個別聚落對於「身體部位空間」、「經濟物種」、「主要漁獲」的認識基礎，果若未來的研究能夠認真對待這些區別，相信能為詞彙、語法的研究帶來新的視角。

整個來說，澎湖群島閩方言身體部位的詞彙外，澎湖群島漁獵、漁法的記載；鄉土史料方面；自然與環境方面，含括澎湖群島植物、魚類以至於各島島名、石滬名稱等等，皆有重新調查研究的必要性。進而言之，這些資料將從過去單純為文化史的一環，轉而納入語言研究的層次。這或許是澎湖群島閩方言未來需要再重新整理一過的，同時是研究者必須倚賴島內文史學者的工作。未來的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研究工作，絕不再僅僅是個人的、獨立的調查工作。

五、結語

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在論題的開拓，以及方法與方法論的層面上，皆仍有繼續深入的必要性。若以臺灣地區閩方言（或是直以閩南方言範圍之）的研究概況作為思考的基礎¹⁸，現行的研究模式，恐怕無法充分解釋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詞彙所透露的實像。本文的想法約略可歸為三點：

第一，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以文獻參照可有兩個階段：《漢語方言調查字表》以及閩南系韻書。可是，若以前者為依據，忽略了中古到近代的文獻語料問題。若以後者為依憑，一方面，產生了「循環論證」的危險性，另一方面，調查所得的語料，轉降為「詮釋」閩南系韻書「音類」的輔助材料。進一步而言，果若研究者能夠先考慮到閩方言「島嶼區域」皆未有傳世的文獻語料，那麼，便必須貫徹歷史比較法的精神，以實際調查語料重建古語系統。¹⁹只是如此一來，閩方言島嶼區域，與閩方言鄰海、內陸區域的聯繫研究，很可能又必須要採取不同的進路。倘若我們暫時脫離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脈絡，採以語言地理學「文化中心向外推移說」，用以解釋澎湖群島-io韻母類型、人稱代詞「誰」的詞彙形式，其兩者與閩方言內陸、鄰海區域的平行對應關係，便可發現閩方言音韻、詞彙研究，不但要「整體的」，還要「區域的」考量文獻語料的問題。嚴格而言，以文獻語料進行方言調查的思路，與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傳統有關。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側重於文獻語料的調查方式，其研究重心屬於語文學（philology）的層次，而非語言學（linguistics）的層次。

第二，臺灣地區閩南方言的調查、研究，是將閩南方言音韻、詞彙和語法三分的（平心而論，這是目前漢語方言學者的基本套路）。三者個別研究的情況下，語料的擇取、論述的方法和檢證的依憑，同樣有著明顯的差別。音韻研究，由於有著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傳統，相較於詞彙、語法研究便嚴謹許多。問題在於，若是要徹底採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理論為研究核心，便需要考量「基本詞彙」的問

題，並與音韻部份結合思考，以取得兩個層面的接軌。至於語法層面，應當細分出閩方言語法、閩方言區域方言語法的差異，以窺探音韻、詞彙與語法三者的運作規則。具體而言，未來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研究，應以聚落（settlement）為基本單位，以「主題故事」為開展基礎，細部的搜羅個人方言音韻、詞彙和語法的表述形式。

第三，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是一體的，研究者不應只提出研究「結論」，而輕忽調查前的設想、程序與施行步驟，以及調查中所涉及的區域文化問題。嚴格而言，調查過程的相關說明，其與調查所得的語料，兩者具有等值性。倘若研究者未能意識到調查過程的重要性，反覆的運用相同思路，即便調查相當寬廣的區域，其所得出的研究成果，究竟能有多少內容是值得我們接續研究的呢？恐怕是個必須審慎深思的課題。

方言調查者必須帶有濃厚的「問題意識」（consciousness of question），任何沒有問題意識的方言調查工作，恐怕經不起任何的檢證。進而言之，方言調查工作，不等於語料搜羅工作；語料搜羅工作是機械式的反射動作，方言調查工作則是研究者能夠自覺到該調查方法、計畫的有效性、侷限性，以及該區域共時、歷時語言和文化上的種種課題，並且能夠具體呈顯於該調查報告內的研究工作²⁰。澎湖群島內部的大小聚落的經濟生活模式，可以漁民村、漁業村為別，因而我們未來所關注的方言調查問題，應該更深入各聚落方言與漁獵文化的聯繫性。

這些年來（2005年1月起始），我們藉由考古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式，由揣摩操作過程，到本篇文章的整體構思，在理論與實際上似乎找到了聯繫的「接榫」。是以，未來澎湖群島閩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我們認為應朝雙軌的方向進行：「語料的大量採集」與「方法的扭轉突破」。「語料的大量採集」需要依靠澎湖地區文史學者，或是重視澎湖群島區域文化的耆老們的協助，方有機會一步一步完整的搜羅。「方法的扭轉突破」，則需要研究者不斷汲取語言學（以及邊際學科）的理論知識，並且不間斷的反思不同學者研究方法的漏洞、縫隙，及其可能的補救方案，並適度運用於「調查」與「研究」兩個層面，且予以調整、改善（從這一點而言，可以回應本文寫作目的，主要是在閱讀、思考董同龢、丁邦新、顧百里、洪惟仁和張屏生五位先生於澎湖群島閩方言相關調查資料，所開展得出的初步報告）。

我們深信，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詞彙和語法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即將步入一個新的時期。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2000 〈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方言》第 3 期，p.194-197。
- 王福堂 1999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甘于恩 周洪濤 2005 〈典型特點與變異特點—域內閩語與周邊閩語之語音比較〉，《暨南學報》（哲社版）No.2, p.86-91。
- 何大安 2008a. 〈“陰出陽收”新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2 分。
- 2008b. 〈《方言洗冤考》的是與非〉，《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 1 期。
- 2008c. 〈速率與續斷—音韻史研究的新視角〉，《語言學論叢》第 37 輯。
- 余藹芹 1988 〈漢語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9 本第 1 分，p.23-41。
- 李如龍 2007 《閩南方言語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呂昭明 2007a. 〈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的初步思考—南島語島名的殘存問題〉，《咾咕石》46：54-82
- 2008a.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 2008b. 〈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與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上)〉，《咾咕石》50：42-65。
- 2008c. 〈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與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下)〉，《咾咕石》51：73-95。
- 2008d. 〈關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調查研究的初步考察〉，銘傳大學定期學術討論會。原訂為 2008 年 10 月 31 日發表，實際發表日為 2008 年 11 月 28 日。
- 林華東 2002 〈關於閩語分區的歷史思考〉，《泉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3 期，p.29-34。
- 胡 方 2005 〈論廈門話[ɿ b ɿ d ɿ g]聲母的聲學特性〉，《方言》第 1 期，p.9-17。
- 洪惟仁 1992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第二年期）臺灣中北部閩南語調查〉，計畫編號：NSC 81-0301-H001-015-G。
- 1992 《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
- 1993a. 〈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畫第三年期—臺灣中部閩南語方言調查報告〉，計畫編號：NSC 82-0301-H001-051-G。
- 1993b. 〈廈門音與漳州音開合口對調（flip-flop）的歷史原因〉，臺北，第一屆臺灣語文國際研討會論文。
- 1993c. 〈現代斗六方言與黃有實《台灣十五音辭典》及《十五音》音系的比較〉，臺灣分館館藏與臺灣史研討會論文。
- 馬重奇 2001 臺灣閩南方言韻書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4 期
- 2002 中國大陸閩南方言韻書比較研究，《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2 期，

p.97-102,118。

- 張琨 1987《漢語音韻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光宇 2003〈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究》第23卷第4期，p.95-103。
- 2008〈漢語方言的魯奇規律：現代篇〉，《語言研究》第28卷第2期，p.8-16。
- 張屏生 1996《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與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張振興 1993《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2003〈現代漢語方言語序問題的考察〉，《方言》第2期，p.108-126。
- 梁玉璋 2004〈福州方言的選擇問句〉，《閩江學院學報》第25卷第6期，p.39-41。
- 梅祖麟 2003〈比較法在中國，1926~1998〉，《語言研究》第23卷第1期，p.16-27。
- 梅廣 2003〈迎接一個考證學和語言學結合的漢語語法史研究新局面〉，《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p.23-47。
- 黃丁華 1958 閩南方言裡的常用否定詞，《中國語文》4月號，p.189-196。
- 游汝杰 1992《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1967《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四。
- 董忠司（主編） 1996《臺灣閩南語概論講授資料彙編》，臺北，臺灣語文學會。
- 楊秀芳 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
- 魯國堯 2003〈論“歷史文獻考據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古漢語研究》No.1，p.2-7。
- 橋本萬太郎 1987〈漢語被動式的歷史・區域發展〉，《中國語文》第1期，p.36-49。
- 羅常培 1930《廈門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四。
- Bynon Theodora 197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Kwang-Chih 1967 Rethinking Archae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hang Kwang-Chih 1972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Module24, p.1-26.
- Douglas Cartairs 1899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Taipei Taiwan SMC Publishing.1990.
- Lehmann, Winfred P. 1973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olt.
- Tsang cheng-hwa 1992 Archaeology of the P'eng-hu island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c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umber95
- 西村朝日太郎 1974《海洋民族学 陸の文化から海の文化へ》，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橋本萬太郎 1978《言語類型地理論》，日本、弘文堂。

—— 1980《現代博言學》，東京，大修館。

林徹 2006 〈言語調査における単位〉、《言語》、vol.35, No.10, p.20-27.

吉田和彦 2007 〈歴史言語学の原点にある形態論〉、《言語》、vol.36, No.8, 60-68.

* 特別感謝黃有興、楊子儀等師長們於會議結束後所給予的諸多鼓勵，至於本文某些未盡的問題，限於時間與篇幅的關係，恐怕無法再進行「系統性」的回應，僅能冀望未來。至於蔡福松老師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方言本字」的課題，這個問題若要根本性的有效解決，牽涉到兩個層面：漢語音韻史的知識與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換言之，查詢現有的閩南語字典、詞典，恐怕僅能提供暫時性的解答，這一點是筆者個人與駱嘉鵬教授看法不同之處。其次，駱教授所提出調查要以「年長者為主」，這一點則是筆者所完全認同的，同時可以說明我們目前的相關研究，其與顧百里、洪惟仁 and 張屏生三位先生於澎湖地區所取得的調查成果，部分語料與詮釋不同的主因，針對澎湖群島的人口結構而言，我們即是採以七十歲以上的耆老為訪談對象。

總的來說，本文最主要的寫作動機，則是認為以往調查澎湖群島閩方言的「方法」、「方法論」需要重新檢視，進一步來說，即便是筆者個人的博士論文，都有重新改寫的必要性，這一點則是筆者有所自覺的，誠如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周法高先生生前所時而言及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研究態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謹以本文獻給我最敬愛的父親 呂能額先生（澎湖馬公後窟潭 1937-2007），並深深感謝父親生前所給予的教導與栽培之恩。回到澎湖從事田野調查期間對於島內諸多耆老們不同形式的協助，同樣必須致上個人最高的敬意與謝意。最後，筆者還要向湯廷池先生、蔡茂豐先生以及趙順文先生在英、日文相關層面的諸多啟發，致上深摯的謝意，特別是趙師順文先生的諸多鼓舞及其充滿智慧的指導，是敦促我在語言學各領域不斷努力向前的動力。

（註1）「疊置」的概念最早是由徐通鏞先生所提出來的，本文則延伸這個概念以是用於語言地理學的思路。

（註2）若是追問「漳州腔」、「泉州腔」除了語音的差異外，「腔」的說法的具體內容為何？則是目前學者們所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語言調查經驗的多寡，僅能說明音韻層面的歷時意義，至於共時層面的解釋，目前的研究模式，無法提供一整套的說法。尤其是調查者記音的檢視工作，應該不會是單純在中古條件下進行，還必須要有實驗語音學的輔助材料，可惜的是，目前方言研究者同時兼顧兩種訓練的學者很可能仍是相當鮮少的。

（註3）從上文所敘述的文字看來，似乎已有確切說法可以囊括整個臺灣地區的語言現象，但若深入推求，很可能只是大體的觀察，因為時至今日，我們尚未能夠整理出一部《臺灣方音字匯》之類的書籍，相較於大陸《漢語方音字匯》成書已逾二十年，箇中原因為何？實有待深入探討。

（註4）徐通鏞（1991：77-78）亦言及：「語音對應關係得到音理上的合理解釋就具有巨大的說服力，使我們在確定語言成分的同源關係時有更大的把握」。

（註5）或有學者認為高本漢的研究模式，並非「重建」古漢語，而是「解釋音類」，這個看法確實是成立的。事實上，有宋以來的漢語音韻學者，即是透過「解釋音類」的方式，用以「尋找音韻單位」，思索自身的母語方言，自身所體認的通語，或是遊歷時的方言記錄等等，這是漢語音韻學的傳統。作為第一部以歷史比較法研究漢語音韻的著作，高本漢的作法考量到漢語文獻語料不能忽略的態度，是值得推崇的。

（註6）以「閩南方言」作為思考臺灣地區母語方言的研究基礎，很可能會造成「循環論證」的問題，另一方面，許多方言現象亦容易以「方言變體」輕易帶過。「變體」的形成因素為何？（語音「近似」、「接近」絕對不會是語言研究所需要的答案）是我們必須提問並且解答的。換言之，「音值」記錄的差異，恐怕不是依據「調查經驗」可以做為檢證的基礎。我們所必須有所體認的，許多音值的爭論關鍵，恐怕在於今日的研究模式尚未建立起「客觀」的檢驗程序。

（註7）Douglas（1899）進行的廈門：漳州的語音對比材料，能否作為臺灣閩南方言調查的

前提？是個必須討論的提問。若以之為「對照組」或許可行，但是若將其視為調查結果訂正的範例，很可能就有值得議論的空間。

（註8）建甌的語料取自《漢語方音字匯》（2003）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註9）這裡是受到余藹芹先生（1988：37）的啟發，余先生談到：「……方言的研究，包括語法在內，實在是日前迫切的任務，而在語言研究中分辨語言層次又是越來越重要的工作」。

（註10）如果說目前臺灣地區閩南方言音韻的調查工作，是企圖貫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精神，則在詞彙、語法部分，很可能尚未考慮周詳。

（註11）請參看朱曉農（2005）上海聲調實驗錄，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註12）余藹芹先生（1988：37）談到：「……方言比較語法的研究，牽涉到漢語方言之間以及漢語和鄰近語言接觸的歷史。近百年來，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達鼎盛時代；然而，音韻只代表語言的構成部分之一，要瞰視語言的全體結構，必須加上詞彙和語法，更需要有系統地進行觀察和分析，否則只能掠取片影碎段，弄不出一個有連貫的體系來。」

（註13）澎湖群島五鄉一市內部的聚落分布、漁獲生產方式、各區域漁場設置所牽動經濟生活模式以及內部移民史等等概況，都是方言調查者必須納入研究範圍的。

（註14）熟稔印歐語的經濟中心，從古代以來將地中海作為核心區域。以印歐語而言，數詞，類似親屬稱謂詞般穩定。然而，並無以之為基礎的理由。為了維持地中海為中心的商圈，因此其不可或缺，所謂簡單明瞭。能夠總稱為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人，所謂從西邊印度洋西端的馬達加斯加島，至東邊波利尼西亞的夏威夷。南到美拉尼西亞，北至臺灣（朝鮮半島的伽）以當時的航海技術的常識而言，實在無法想像有這麼廣大區域的擴展，是否與之有關係呢？準此，類似此種急速擴展，如果排除各地孤立而發達的語言。農耕民型的語言，因其依據中心言語的同化以及持續的借貸關係，將其同化的機制，分析清楚，類似印歐語成功的情況，依據比較法重建祖語是非常困難的。

（註15）筆者翻譯：可以說，關於漁民在同一個語言文化共同體當中，明確的與農民有所區別的現象，並非僅有日本。處於歐洲大陸西南端的 Iberia 半島，其海岸區域除了純粹的漁村之外，漁民多居住在鄰近的貧民街坊，鄰人與傳統、習慣皆非常怪異，與其他聚落有著強烈的不協調性。順此，漁民與鄰近居民並無過多的接觸，通婚的關係亦非常稀少。進一步而言，關於地中海以及亞洲南部，以不同團體所組成的漁民共同體儘管數量不少，即便在中國亦能看到相近事實的文書記載。最初從事漁撈與狩獵的民族，即所謂德語的「採捕民族」的概念，以那些擁有最原始文化的民族，無法進行再生產的經濟學性質的傳統習慣，全然以奪取山產、海產，即是所謂從事掠奪經濟模式的民族。……漁撈活動的物質基礎在於漁具的外型、機能，即使不論其止水、流水的功能，仍不得不考量水的液體性質。……

關於自給自足階段的漁撈活動，因為可見於沿海區域的情況稀少，因而這樣的漁撈活動大多呈現帶狀分布的情況，這在河川地區是相同的情況。海岸線以及河川，又特別是關於未開發地區，因為是極為重要的交通孔道，漁具的使用便快速傳播，並佔有很大的比率。茲舉一例證，在北美西部的印地安高原文化區域，大河川中唯一的生物，特別是當鮭魚數量持續增加，這個區域的部落，往往隨著鮭魚的移動而遷徙。由於那些部族生產手段是較為複雜的漁撈技術，如使用漁柵、築、引網、突刺具、掬網等等工具，而瞭解到諸部族，並承認其間相當大程度的相似性。

（註16）在澎湖調查期間，竹灣村的基本詞彙尚包括：臉頰 □□ui pue 、舌 □i 、嘴唇 □ui tun （上唇、下唇的音讀分別為（tiŋ tun ；e ka tun ）。）、眼 ba□ □iu 、眉毛 ba□ bai 、鼻孔 pī k□aŋ k□au 、下巴 e tau□ 、脖子 am kun a 、手骨 □iu ku□ 、拇指 □□ t□au bu 、食指 ki □an 、中指 tion□ an 、小指 b□ niō a 、手心 □iu tion□ sim 、手盤 □iu pūā 、手腕 □iu bā□ 、腳腕 ka bā□□

（註17）澎湖群島身體部位的「詞彙結構」成因而言，對於「人體」、「事物」的「指稱」、「概念」，各區域皆有其不同的「認知」(cognition)，或可以認知語言學「圖像理論」(「Script theory」Schank 1975)繼續研究之。

（註18）實際上，臺灣地區閩南方言音韻方面的調查研究，仍有不少面向尚未有可靠的論著。閩方

言（尤其閩南方言）的文、白音讀，幾乎是各成系統的。但是，這一點認識基礎，能否再透過實際調查，說明臺灣各區域內部方言文、白音讀的運作模式？早期傳教士所纂作字典所歸納出的文、白音讀現象，能否作為研究臺灣閩南方言的前提？個人口語中文、白音讀語用層次的區野為何？聚落內部文、白音讀的實際情況為何？從這些問題看來，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部分的研究，還有為數眾多的課題值得深入。儘管上述的提問，看來有某種程度的針對性，然而我們的研究態度，仍是立基於前輩學者已成的研究與觀察上進行，這是必須補充說明的。

（註19）《漢語方言調查字表》、《漢語方音字彙》和《漢語方言詞彙》幾近為漢語方言調查者的依憑，從初步的調查研究言之，的確有短時間內便可獲得調查成果的效益。不過，倘若意識到「方言與區域文化」的聯繫性，便必須再思考這種單一調查方式的侷限性，以及能否實際反映該調查區域的語言使用狀況。順著這個想法，我們認為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在某個程度上，確實為漢語方言學建立起研究的框架，倘若不以分析既成語料為滿足，或是單純承接前輩學者的學說論述，則方言研究不應只是考量理論層次的相關課題。在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層面，我們認為研究者應該嘗試以某一理論貫徹思考之，而非將語言學次學科的不同概念、術語系統混而淆之，混淆的結果誠然顯示研究者的博學，但是卻也顯示研究者自身於語言學次學科理論的認識，是有選擇性的吸收與排斥，這對於建構漢語語言學的理論自然是不利的。某一種理論建立後，自然無法接受其他理論的運作規則，但是，這是建立在該理論成系統的情況之下。

（註20）同樣的，方言研究者並非僅止於搜羅已完成的方言調查報告，而當以此為基礎工作，從而不斷反思理論與實際的問題，最重要的不外是：田野調查。果若方言學者抱持著目前成說已定，毋須再從事調查，甚至抱持著後起的調查結果，亦僅能說明「後起的演變」等等理由。那麼，不論在共時（synchronic），或歷時（diachronic）層面，漢語方言研究，恐怕無法開展出一個新的研究格局。如此一來，語言（方言）研究的意義性，恐怕將不復存在。消化前輩學者所調查的語料，自成一說固然有得，然此僅為「承先」的工作，語言研究者還要能夠作到「啓後」，亦即讓下一個世代的研究者，能有足夠的訊息檢視我們這一代的研究成果。

主 題：澎湖群島閩方言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發表人：呂昭明

評論人：駱嘉鵬

評論內容：

1. 各地語言的多樣性豐富我們的生活，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化的傳承有賴於語言的詳細調查、實錄與研究。
2. 語言研究田野調查的對象應以年長者為主，以避免語音被外界同化的問題。

提問人：蔡福松

提問內容：

感謝各位學者的精采報告，個人僅就平日撰寫地方文史的心得提出拙見，敬請解惑。

1. 地方人名、地名、物名等方言語詞中，有些同音調不同字、有些同字不同語調，若諸多語詞皆仰賴國字，則又失去原有韻味，請教此種情況該如何定調為佳。

方言田調報告的受訪者若年齡太輕，則容易被類化，甚至同化。如何取樣應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發表人答辯：

目前調查及研究語言聲調有一套統一的音標。希望澎湖在地的老師與先進能大力協助我在日後本地的田野調查，期許日後在澎湖縣誌中能見到方言誌及語文誌的問世。

評論人回應：

在媒體上對於方言書寫無法統一，甚至有許多方言詞彙無法以文字書寫，而教育部已公佈網路版的標準閩南語通用字典，建議語言研究者勿以自創的音標或借字。